

金樓子校箋

上冊



NLIC 2970697484

〔梁〕蕭繹撰 許逸民校箋

中華書局

〔梁〕蕭繹撰 許逸民校箋

中華書局

金樓子校箋

上册



NLIC 2970697484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金樓子校箋/(梁)蕭繹撰;許逸民校箋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1.1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722 - 3

I . 金… II . ①蕭…②許… III . 政治 - 謀略 - 中國 - 古代 IV . D69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234120 號

責任編輯:劉彥捷

金樓子校箋

(全二冊)

[梁]蕭繹撰

許逸民校箋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48½印張·4 插頁·1170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148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722 - 3

前言

《金樓子》原本十卷，梁元帝蕭繹（五〇八—五五四）撰，向無異辭。此書最早著錄於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亦見於《南史·梁本紀下·元帝紀》，《隋志》、《南史》皆成書在唐朝初年，去梁不遠，所說當屬可信。及至南宋，《楓窗小牘》猶記其軼事云：「余嘗見內庫書《金樓子》，有李後主手題曰：『梁孝元謂：『王仲宣昔在荊州，著書數十篇，荊州壞，盡焚其書，今在者一篇，知名之士咸重之。見虎一毛，不知其斑。』後西魏破江陵，帝亦盡焚其書，曰：『文武之道，盡今夜矣！』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？詩以慨之曰：『牙籤萬軸裹紅綃，王粲書同付火燒。不是祖龍留面目，遺篇那得到今朝。』」書卷皆薛濤紙所鈔，惟『今朝』字誤作『金朝』，徽廟惡之，以筆抹去。後書竟如識入金也。」（卷上）可證宋金時期，內庫尚有十卷本完帙。元至正間，江南名士葉森，於梁元帝情有獨鍾，既爲《古今同姓名錄》增補闕陋，又將《金樓子》重鈔一過，藏於西湖書院。葉鈔當時是否付梓，已無從考知。元末明初，陶宗儀《說郛》（宛委山堂本）錄有《金樓子》二十三條，號稱一卷，乃約略

取之以備品種之舉。嗣後，明朝纂修《永樂大典》，分韻採編群籍，其中凡署爲《金樓子》者，無不取自葉森鈔本。葉森鈔本迄今未見有書目著錄，不得其詳，按常理推斷當是十卷足本，否則《大典》不會取爲藍本。惟自經《大典》分拆引錄之後，《金樓子》十卷本從此便如泥牛入海，聲息全無。其十卷原本舊貌，終成爲半遮半露下的一個謎團。

今存《金樓子》止六卷，已非十卷本舊觀。是本之來歷清晰可見，乃清人爬梳《永樂大典》諸韻，蒐採《金樓子》碎金而纂集成編。其纂輯者誰耶？毫無疑問，就是四庫館臣周永年（一七三〇—一七九一）。永年字書昌（一作「書倉」、「書滄」），山東歷城（今山東濟南）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（一七七二）進士。三十八年，入《四庫全書》館爲纂修。此公學識淵博，頗好輯佚，先後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得《周易口訣義》、《周官新義》、《金樓子》、《公是集》、《彭城集》、《浮溪集》、《斜川集》等佚書，堪稱乾嘉輯佚學之大收穫。說《金樓子》六卷本輯成於周氏之手，證據赫然見於汪輝祖之《書金樓子後》。鮑廷博《知不足齋叢書》第九集行將剞劂之際，請汪爲《金樓子》六卷本題跋，汪遂作《書後》，追述事之始末，無意間爲《金樓子》六卷本開具了一紙重生證明。汪文曰：

往余之乞《二母雙節詩》於周太史書倉也，實介邵君二雲、羅君臺山。越二年丁

酉，孫君遲舟入都，余又舉以相屬。己亥孟冬，余客吳興，得遲舟書，則太史贈言，久託臺山郵寄，而臺山蹤跡，渺不相知，浮沈之感，寤寐縈迴。將裁書以詢二雲，會二雲之族需葵，至自長沙，言戊戌重九，二雲北上，遇臺山於吳門，臺山出周太史貽余書軸，長尺有奇，厚幾二寸，授二雲轉寄，需葵曾受其書，由武林寄余，而余未之得也。是夕，遂治裝至武林求之。歷五旬又二日，而後得之於望江門外素不相識之人之手。蓋二年以來，輾轉付託，閱十有餘人，題緘之字已磨滅殆盡，不可辨識，而緘封且半敝矣。啟而讀之，不惟雙節贈言無恙也，太史從《永樂大典》輯錄《金樓子》六卷，命致鮑君以文者，亦儼然在焉。齎達以文，相與忻幸久之。

此文書於乾隆四十六年（一七八一），文中所謂「鮑君以文」者，即鮑廷博（一七二八—一八一四）也。廷博字以文，安徽歙縣人，寓居杭州，家富藏書，且喜刻書。鮑從汪手得到周輯《金樓子》六卷本後，經仁和朱文藻、海寧吳騫校訂，隨即刻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。而周氏所輯原稿，亦得人編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，《總目提要》但謂之「《永樂大典》本」，未署輯錄人。此後，《金樓子》六卷本又有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刊刻之《子書百家》本，一九一七年刊刻之《龍谿精舍叢書》本，以及一九一九年掃葉山房石印之《百子全書》本。凡此諸

本，莫不襲用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，了無新意。惟有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排印本，略具特色。因為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收錄百部叢書，其中《知不足齋叢書》和《龍威秘書》皆有《金樓子》，《知》為六卷本，《龍》為一卷本，商務排印本儘管明言依據《知》本，但文字時有出入，想必曾參照《龍》本有所校改。綜上所述，《金樓子》六卷本的版本源流與優劣，顯而易見，編入《四庫全書》者理應視之為祖本，而校勘精善者當屬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，晚出而具有新意者為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其餘諸本皆可置之不論。

蕭繹是梁武帝第七子，小名七符，與長兄蕭統（五〇一—五三一）、三兄蕭綱（五〇三—五五一）情誼甚篤。繹七歲封湘東王，四十五歲乃於江陵稱帝，雖說屬於庶出，不如蕭統有過「監撫」之任，也不如蕭綱曾被立為皇太子，然其一生「早賜茅社，祚土瀟湘，褰帷陝服，早攝神州，晚居外相」（《金樓子序》），亦屬尊貴之至，所謂「一沐三握髮，一食再吐哺」（《立言篇上》）、「文案盈前」（《金樓子序》）的狀況，當不難想見。由身居外相以至承制，冗務紛擾，略無寧日，焉能够潛心著述，親手撰就《金樓子》十卷？再者，當時尊者倩他人代筆，屢見不鮮，且不說梁武帝如何，即便在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中，蕭繹也不諱言其中有交付屬下代撰之作，斯乃當日世風，並不以為有汙清譽。那麼，《金樓子》果由蕭繹自

撰歟？答曰「然也」，《金樓子》書中自有鐵證在焉。今即擇其要，臚列如下：

一、《金樓子序》：「余於天下爲不賤焉。竊念臧文仲既歿，其言立於世。曹子桓云：『立德著書，可以不朽。』杜元凱言：『德者非所企及，立言或可庶幾。』故戶牖懸刀筆，而有述作之志矣。常笑淮南之假手，每蚩不韋之託人。由是年在志學，躬自搜纂，以爲一家之言。」按，古人多在成書後作序，蕭繹有此序，說明全稿已然殺青有日，萬端感慨油然而生。回首纂集緣起，不免申明其少年時代已有述作之志，開始「躬自搜纂」，擬通過立言之途徑，獲取後世不朽之聲名。

二、《立言篇上》：「裴幾原問曰：『西伯拘而闡《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孫子之遇龐涓，韓非之值秦后，虞卿窮愁，不韋遷蜀，士羸疾行，夷、齊潛隱，皆心有不悅，爾乃著書。夫子實尊千乘，舉帷萬里，地得周旦，聲齊燕奭，豪匹四君，威同五伯，玳簪之客，雁行接踵，珠劍之賓，肩隨鱗次，下帷著書，其義何也？殊爲牴牾，良用於邑。』予答曰：『吾於天下亦不賤也，所以一沐三握髮，一食再吐哺，何者？正以名節未樹也。吾嘗欲稜威瀚海，絕幕居延，出萬死而不顧，必令威振諸夏。然後度聊城而長望，向陽關而凱入，盡忠盡力，以報國家。此吾之上願焉。次則清濁一壺，彈琴一曲，有志不遂，命也如何。脫略刑名，

蕭散懷抱，而未能爲也。但性過抑揚，恒欲權衡稱物，所以隆暑不辭熱，凝冬不憚寒，著《鴻烈》者，蓋爲此也。」又問之曰：「子何不詢之有識，共著此書，曷爲區區自勤如此？」予答曰：「夫荷旃被毳者，難與道純綿之緻密；羹藜含糗者，不足論大牢之滋味。故服絺綌之涼者，不苦盛夏之鬱煩；襲貂狐之煖者，不知至寒之淒愴。予之術業，豈賓客之能闕？斯蓋以荏撞鍾，以蠡測海也。予嘗切齒淮南、不韋之書，謂爲賓遊所製，每至著述之間，不令賓客闕之也。」按，此處所謂「著《鴻烈》者」，應即纂集《金樓子》也。蕭繹於書中頻繁引錄《淮南子》，而《淮南子》一名《淮南鴻烈》，因而推測蕭繹初時亦名己書爲《鴻烈》，後始改稱《金樓子》，故《隋書·經籍志三》謂「有《補闕子》十卷、《湘東鴻烈》十卷，並元帝撰，亡」，其實所亡者唯止前用書名而已。在與裴子野的問答中，蕭繹下帷著書的決心與不許他人染指的意願，悉袒露無遺。

三、《立言篇上》：「顏回希舜，所以早亡；賈誼好學，遂令速殞。揚雄作賦，有夢腸之談；曹植爲文，有反胃之論。生也有涯，智也無涯，以有涯之生，逐無涯之智，余將養性養神，獲麟於《金樓》之制也。」按，「獲麟」用孔子作《春秋》事，喻稱絕筆。「余將養性養神，獲麟於《金樓》之制」者，猶謂欲畢其一生精力於《金樓子》也。

四、《雜記篇上》：「余作《金樓子》未竟，從荊州還都，時有言是鍛真金爲樓子者，來詣余。三爵之後，往往乞借金樓子：『玩弄之，應大奇巧。』此則近可哈也。」按，此事當發生在大同五年（五三九），蕭繹是年八月入遷安右將軍、護軍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，年三十二，相去幼年立志不過十多個春秋，故「作《金樓子》未竟」，但其自撰之事實，亦可以此驗證。

以上四點，不惟可以坐實《金樓子》撰人非蕭繹莫屬，而且從中還可以知道《金樓子》的纂集萌芽於其少年時期。至於此書何時殺青，史無明文，按其中條目揣斷，大抵相當於太清、承聖之間。諸如《自序篇》有云：「頻喪五男，銜悲怳忽，心地荼苦，居則常若尸存，行則不知所適。有時覺神在形外，不復附身。及以大兒爲南征不復，繼奉國諱，隨念灰滅，萬慮盡矣。」其大兒方等南征不復在太清三年（五四九）三月，而「國諱」謂梁武帝之死在太清三年五月。又《聚書篇》云：「吾今年四十六歲，自聚書來四十年，得書八萬卷。」蕭繹卒於承聖三年（五五四）十一月，四十七歲，四十六歲則是承聖二年。如此看來，蕭繹纂集《金樓子》之事，自少年至中年，從未中輟，一如其願，終成「獲麟」（絕筆）之作。蹉跎歲月，三十餘載，試問是何種動機在激勵此人，又是何種精神力量在支持此事？

我以為其著述動機與精神力量可以歸結爲兩點：一是其紹聖思想，二是其政治抱負。在《金樓子·立言篇上》有兩段話，最遭世人詬病，其一：「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，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。五百年運，余何敢讓焉。」其二：「飽食高臥，立言何求焉？修德履道，身何憂焉？居安慮危，戚也；見險懷懼，憂也。紛紛然榮枯寵辱之動也，人其能不動乎？仲尼其人也，抑吾其次之。有佞而進，有直而退，其寧退乎？」此二條皆提及孔子，且以孔子自喻，故《四庫提要》斥其「儼然上比孔子，尤爲不經」。其實蕭繹出言狂妄，並不足怪，他所稟承的無非是儒家的「王命」思想，如孟子所說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）又說：「千年一聖，五百年一賢，賢聖未出，其中有名世者。」（《文選·李少卿答蘇武書》李善注引《孟子》）而蕭繹坦然承認他想成爲一個「名世者」（「命世者」），正是他對生命價值的一種期許，何爲不可？再者，前文已引錄蕭繹答裴子野問，其中所說不可謂不直白，他自我剖白，原本想立功沙場，收復中原，有一番「盡忠盡力，以報國家」的英雄壯舉。然而，時不我與，志不能遂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一心著書立說，樹立名節，以求不朽。爲達至「其言立於世」之目的，他可以「隆暑不辭熱，凝冬不憚寒」，可以「俾夜作晝，勤亦至矣」（《金樓子序》），可以「比以來三十餘載，泛玩衆書萬

餘矣」(《自序篇》)，可以「每宴輒早罷，不復沾酌」(《立言篇上》)。今日看來，不論其言行之間存在多大反差，至少就希求立言的層面上說，所表達的是一種思想境界。處在北分裂、社會動盪的時代，身為皇子，養尊處優之下，有此種思想境界的表達，即便與高尚無多關涉，又何罪之有？

蕭繹性狷急而偏狹，多猜忌，於名無所假人，微有勝己者，必欲除之而後快。這一性格缺陷，本人亦心知肚明，《金樓子》中不乏自我追悔之詞。所以要追悔，唯因為志在遠大，不欲受此牽累。當初去丹陽尹而出為荊州刺史時，梁室重臣徐勉曾有和詩，內中稱頌道：「敬愛良是賢，謙恭實所務。尊賢遺道德，重學嚴師傅。六藝誠為敏，三雍稱有裕。覆被唯仁義，吐納必圭璋。壯思如泉湧，逸藻似雲翔。夙有匡時調，早懷經世方。留心在庶績，厲精思治綱。」(《藝文類聚》卷五〇引梁徐勉《和元帝詩》)所謂「夙有匡時調，早懷經世方」，足以見出蕭繹的政治抱負委實不小。姑且不去談其政治抱負是勵精圖治，還是覬覦皇位，止說他在《金樓子》一書所闡發的見解，的確有不少高明之論，可資為政者借鑒。如《雜記篇下》云：「余好為詩賦及著書，宣脩容敕旨曰：『夫政也者，生民之本也。爾其勗之。』余每留心此處，恒舉燭理事，夜分而寢。」又《立言篇上》云：「哲人君子戒盈

思冲者，何也？政以戒懼所不睹，恐畏所不聞，況其甚此者乎！夫生自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憂懼之所不加，寵辱之所未至。粵自韶齡，便作邦君。其天姿卓爾，則河間所以高步，窮兇極悖，廣川所以顯戮，致之有由者也。錫瑞蕃國，執玉秉圭，春朝則驅馳千乘，秋謁則儀刑百辟，江都、廣川，可以意者耳。請論之，一曰驕，二曰富，三曰姪，四曰忌。幼饗尊貴，驕也。名田縣道，富也。歌鍾盈室，姪也。殺戮無辜，忌也。夫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，況倍此者邪？夫貴而不驕者，鮮矣。驕則輕於憲網，富則恃於金寶，姪則惑於昏縱，忌則輕於生殺。既不知稼穡之艱難，又不知民天之有本，徒見珠璣犀甲之翫，金錢翠羽之奇。動容則燕歌鄭舞，顧盼則秦箏齊瑟，謂與椿鵠齊齡，寧知薤華易晚！覆其宗社，曾不三省，損其身名，不逢八議，異矣哉！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無爲不善而怨人，無刑已至而呼天。身不善而怨人，不亦反乎？刑至而呼天，不亦晚乎？太公曰：『夫爲人惡聞其情，而喜聞人之情；惡聞己之惡，喜聞人之惡。是以不必治也。』似此之類警妙之語尚多，無煩多引。由此可以說，蕭繹不但政治上有抱負，而且從政也還算清醒。

不過蕭繹畢竟不是成功的政治家，治國安民亦無多建樹。他留給今人的主要印象，僅限於一個耽於詩文的作者罷了。他的詩文作品迄今留存不少，前人輯有《梁元帝集》可以參看。其詩文未見得如何佳妙，可貴者是其對文學屬性、創作機理的認知水準。近代國學大師黃侃先生，在其《文選平點》中評論《文選序》時寫道：「此序選文宗旨、選文條例皆具，宜細事審繹，毋輕發難端。《金樓子》論文之語，劉彦和《文心》一書，皆其翼衛也。」《文選》是我國今存最早的詩文總集，由蕭統纂集於梁朝，《金樓子》與《文心雕龍》亦成書於梁朝，三書是同一時代的產物，故黃侃將《金樓子》與《文心雕龍》並列，統稱為《文選》之「翼衛」。黃氏之「翼衛」說，是以文學眼光看《金樓子》，對其中有關文學的言論評價極高。我服膺黃說，不過本文不擬全面辨析《金樓子》的文學因素，祇想從中彙錄三五條，聊以顯現蕭繹文學批評的精髓所在：

一、《立言篇上》：「擣衣清而徹，有悲人者。此是秋士悲於心，擣衣感於外，内外相感，愁情結悲，然後哀怨生焉。苟無感，何嗟何怨也。」

二、《立言篇上》：「諸子興於戰國，文集盛於二漢，至家家有製，人人有集。其美者足以叙情志，敦風俗；其弊者祇以煩簡牘，疲後生。往者既積，來者未已，翹足志學，白首不

偏。或昔之所重，今反輕；今之所重，古之所賤。嗟我後生博達之士，有能品藻異同，刪整蕪穢，使卷無瑕玷，覽無遺功，可謂學矣。」

三、《立言篇下》：「管仲有言：『無翼而飛者，聲也；無根而固者，情也。然則聲不假翼，其飛甚易；情不待根，其固非難。』以之垂文，可不慎歟！古來文士，異世爭驅，而慮動難固，鮮無瑕病。陳思之文，群才之雋也。《武帝誄》云『尊靈永蟄』，《明帝頌》云『聖體浮輕』，『浮輕』有似於蝴蝶，『永蟄』可擬於昆蟲，施之尊極，不其嗤乎？」

四、《立言篇下》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學而優則仕，仕而優則學，古人之風也。修天爵以取人爵，獲人爵而棄天爵，末俗之風也。古人之風，夫子所以昌言；末俗之風，孟子所以扼腕。然而古人之學者有二，今人之學者有四。夫子門徒，轉相師受，通聖人之經者，謂之儒。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長卿之徒，止於辭賦，則謂之文。今之儒，博窮子史，但能識其事，不能通其理者，謂之學。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，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汎謂之筆。吟詠風謠，流連哀思者，謂之文。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，守其章句，遲於通變，質於心用。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，辯經教之宗旨，徒能揚榷前言，抵掌多識。然而挹源知流，亦足可貴。筆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惠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

維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脣吻適會，情靈搖蕩。而古之文筆，今之文筆，其源又異。至如彖繫風雅，名墨農刑，虎炳豹鬱，彬彬君子。卜談『四始』，劉言《七略》，源流已詳，今亦置而弗辨。潘安仁清綺若是，而評者止稱情切，故知爲文之難也。曹子建、陸士衡皆文士也，觀其辭致側密，事語堅明，意匠有序，遣言無失，雖不以儒者命家，此亦悉通其義也。偏觀文士，略盡知之。至於謝玄暉，始見貧小，然而天才命世，過足以補尤。任彥升甲部闕如，才長筆翰，善緝流略，遂有龍門之名，斯亦一時之盛。」

五、《立言篇下》：「銘頌所稱，興公而已。夫披文相質，博約溫潤，吾聞斯語，未見其人。班固碩學，尚云贊頌相似；陸機鉤深，猶稱碑賦如一。」

《金樓子》屬於雜家著作，內容富贍，「古今聞見，治忽貞邪，咸爲苞載，附以議論，勸誡兼資」（《總目提要》語），本文限於篇幅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逐一論辯，唯能就其大節，略申淺見。對蕭繹其書如此，對蕭繹其人亦如此，僅憑《金樓子》一書，不及史傳和詩文，如何可能爲蕭繹寫出終生判詞？但讀其書而想其人，事先總宜給人一個概要形象爲好，於是我求助於前代史家，果真讜言在焉，遽取之以代結語。

其一，梁何之元（？——五九三）之《梁典》：「世祖聰明特達，才藝兼美。詩筆之麗，

罕與爲匹；伎能之事，無所不該。極星象之功，窮蓍龜之妙。明筆法於馬室，不愧鄭玄；辨雲物與魯臺，無慚梓慎。至於帷籌將略，朝野所推，遂乃撥亂反正，夷凶殄逆。紐地維之已絕，扶天柱之將傾。黔首蒙拯溺之恩，蒼生荷仁壽之惠。微管之力，民其戎乎？鯨鯢既誅，天下且定，早應移鑾西楚，旋駕東都，裡祀宗祊，清蹕宮闕。西周岳陽之敗績，信□宇文之和通，以萬乘之尊，居二境之上，夷虜乘釁，再覆皇基。率土分崩，莫知攸暨，謀之不善，乃至於斯。」（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五四《梁典·高祖事論》）

其二，《梁書·敬帝紀》史臣魏徵（五八〇—六四三）語：「昔國步初屯，兵纏魏闕，群后釋位，投袂勤王。元帝以盤石之宗，受分陝之任，屬君親之難，居連率之長，不能撫劍嘗膽，枕戈泣血，躬先士卒，致命前驅，遂乃擁衆逡巡，內懷缺望，坐觀時變，以爲身幸。不急莽、卓之誅，先行昆弟之戮。又沉猜忌酷，多行無禮。騁智辯以飾非，肆忿戾以害物。爪牙重將，心膂謀臣，或顧眄以就拘囚，或一言而及菹醢，朝之君子，相顧慄然。自謂安若泰山，舉無遺策，怵於邪說，即安荊楚。雖元惡克翦，社稷未寧，而西鄰責言，禍敗旋及。上天降鑒，此焉假手，天道人事，其可誣乎！其篤志藝文，採浮淫而棄忠信；戎昭果毅，先骨肉而後寇讎。雖口誦《六經》，心通百氏，有仲尼之學，有公旦之才，適足以益其驕矜，增